

于夢飛自傳



民族出版社
1999年9月30日

夕 阳 红

——六十岁生日作

六十霜秋染鬓斑，
浩空明月慢卷帘。
坎坷岁月成过去，
箫管不悔醉时弹。
老当凌云鹏程远，
骐驎奋蹄别有天。
昨夜东流无恨水，
不羞白发对逝年。

——于梦飞

1995年11月24日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

1935年11月9日：这一年农历是猪年，农历十月初三。我出生在黑龙江省大赉县城里，既城内大北门里南北中央大街的路西，名叫“半截胡同”的于二先生家。

我们于家，原系山东省海阳县人。约在1880年左右，曾祖于贵，由原籍搬迁到边外，落脚在吉林省怀德县的农村黄花甸子。1920年左右，搬到黑龙江省大赉县的城西苗家围子村。之后又搬到大赉县城北，约20里路汉蒙杂居的前宝石村居住，曾祖于贵的坟就埋葬在前宝石村。约在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后，因受土匪骚扰，又搬到大赉县城里，大西门殷家炉大院居住。最后又搬到大赉县城里，大北门里半截胡同，直住到祖国解放后。

我家祖父辈兄弟四人。我祖父排行老二，叫于占江。他生于1880年，卒于1952年，享年72岁。祖母于扬氏：生于1885年，卒于1972年，享年87岁。祖父原是以种地为生，还曾经营马匹的买卖行业，后经名人指教，做了阴阳风水先生。

阴阳家，《汉书艺文志》里面讲得十分清楚：“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数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阴阳家，大体分两派。一是主流派：四方之度，四时之运，五行之性，八风之气。为国家制定各种律历、指导各种祭祀的人，被官方看作主流派。二是另一派：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的人。真正在宫廷庙堂之下层社会发生影响之人。

《周易》就是在总结了以广泛的矛盾现象的基础上，用阴阳变化的观念，来解决生产和社会矛盾的有力尝试，核心是趋

古避凶的。看来，阴阳家们顺天意、安邦国、重民生真是很得国人之心的。我祖父，则就是属这后类阴阳先生。

由于我祖父为黑龙江省万福麟督军迁坟得誉“于二先生”。从此名垂大赉、新庙、扶余、郭尔罗斯前旗、乾安、肇源等县，一时名声大震，家业兴盛。祖父母共生育四男五女，大都进学校受过教育。是个富足、殷实、在县城有一定名望的人家。

伯祖父：于占海。此人终生未婚，独自一人在当时黑龙江省安达县，一个造酒厂烧锅挣了钱，被人图财害了命。无后人。三祖父：名不详，未婚前病逝。四祖父：名不详，婚前有病，请大神医治，扎针至死。也无后人。实际祖父辈，虽兄弟四个，但留下后人的只我祖父这一支。

我们虽然上辈是个多子女的家族，而伯父与伯母和我们这一支都各自独立生活，家里爷爷奶奶、三叔三婶和尚没结婚的老叔，住在半截胡同的自家大院的老房子里。我们则住在大南门里路西，那是坐北朝南的三间平房，前院是一个临街的四合大院，《大赉县博记慈善会》就在这里，当时我父亲在那任理事长。在他管理的慈善会里，赡养着不少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和许多年龄不等的孤儿。除了老人和小孩外，所有的学龄孤儿们，都在慈善会小学里读书。

那是个穷苦不幸人们的幸福和谐的大家庭。由于我时常和哥哥去那玩，我们也结识了不少老人孩子们。如年老的老汤头、老刘头、老王头：孤儿汤博海、刘博礼、刘博义、陆博文、王博儒、甘博柱等。这些人现在有的早就不能在世了，而当时较小的怕也 60 到 70 多岁了。如果他们现在还活着，也一定会记起在大赉县博记慈善会那个不幸人避风港的生活时，一定还能勾起一些难忘的记忆的。少儿时，我就知道我的父亲，是在

做着有益社会的慈善事业。在我们家乡大赉县城里，还颇有点名气。父亲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就是个救世济贫的人。

1942年春，我的名字叫梦飞，这是我小时父亲为我起的学名。上学后，先生说我的名字起得好。后来我曾问过父亲，他告诉我这个名字是有典故的：周文王做了个“夜梦飞熊”的梦，谋臣析梦认为，这是将有贤者出世辅政的予兆。至使周文王到渭水河上访贤，才识出姜太公出世，辅佐周皇完成帝业。从我的名字上看，似乎我父亲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呢！也说明父亲对我的期望。名字，只不过是人的代号而已，又何必这样苦心呢？不幸我遗憾的是过早的失去了对我寄以厚望的父亲。这之后，我在人生艰难的跋涉，尽管父亲曾为我起了个美好的名字，也并没能给我带来好的运气。经过我30多年拼搏，知天命后才实现了父亲的期望：抚顺日报编辑吴晓丽，为我写了《于天立河阔时，白云起梦飞》的报导；抚顺电视台编辑陈庆斌和左许生，为我写了《会飞不是梦》的小传。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父亲，毕业于伪满国民高等学校，是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他在县城里一直是从事慈善事业的领导人，管理着敬老院、孤儿院和孤儿学校。他中等身材、四方大脸、浓眉大眼，长得很帅！他天资聪颖，热情豪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风范和忠厚正直的风骨。他会唱流行歌曲、拉二胡、吹口琴、下棋画画样样都行，在他的身上，总是显露着聪明与活泼、多才和多艺、信心和力量，他做事干练利落，从不萎靡不振和窝窝囊囊！总之，父亲在我的心里真棒。

1943年春，我和哥哥在伪满《大赉县仁德学校》上学时，父亲去大连出差，回来给我和哥哥每人买一个书包和文具盒。

那是个背在背后双肩的黑色皮书包和画着一个男孩念书的簿铁文具盒。现在看来，倒也算不了什么贵重的东西，而那时我和哥哥都高兴极了！这两件礼物，是我童少年时最心爱的东西了。那时，父亲在我的心里，真是非常爱我们的好父亲。

1945年9月，我伯父叫于鸿福，字秉夷。生于1905年，卒于1960年前。1952年春，我祖父在他逝世前对我们家人说过：老大于1945年“8·16”光复后去了抚顺，在龙凤矿做工。改姓姥家姓，更名叫杨化南。伯父曾在大费县伪政府当过警察，解放后定为四类分子。据我大舅徐仁讲，我伯父病死于三年灾害时期。伯母娘家姓毛，她俩个哥哥在大费县城里自家开皮货店。她生于1910年，卒于1945年9月，死在南去途中路上，时年35年。伯父母婚后生一男孩，小名叫“胡锁”，上学前被车压死了。伯父家三口人，都早过世，这支无后人。

我老叔叫于鸿祥。1924年出生于大费县，1952年死于台湾，老叔日伪时期毕业于大费县国民高等学校。他篮球打得好，是当时学校篮球队长，也会武术、刀枪剑戟样样通，毛笔字写的非常好。据我祖父52年病逝前说：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他与我伯父同时出走，离开大费县，后来他进航空学校学习。47年大费县与我家同住在半截胡同的姓徐的胶轮车运输户徐老大，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长春，看到过我老叔，他由长春回大费后对我家说，当时我老叔是空军飞行员，解放后则不知去向。94年3月我老姑来信告诉我，粉碎四人帮后，大陆与台湾可以探亲，郑大院家属从台湾来，口述如下情况：说我老叔49年去的台湾。由于他有才华、有智慧，有超人的智能和表现，使他晋升为三花上校军官，当时在国民党空军总部任秘书长。后来他结识女军官说是“大陆特务”，一些机密被大陆破

获，总部对他产生怀疑，他被陷害。五二年初他用手枪自杀了，但是否他杀也未可知。时年二十八岁。也不知成家否？有否后人？这只待台湾回归之后，再了解了。

有关我们的家史，后来我写了《不求金玉富，但愿子孙贤》的六世家谱，这是后话了。

1945年9月初：由于国共在我故乡大赉县的磨擦不断，各学校也都没有开学。因此，我也从此失学了。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

1946年：祖国光复后，大赉县博记慈善会改为《大赉县孤儿院》，我父亲仍任理事长。46年初春，孤儿院有两名教师，男的姓周，当时30来岁，已有妻室儿女；女的她姓徐，当时24岁上下，尚未婚配。其二人的不正当关系，孤儿院是众所周知的。我父亲是领导人，为纯化风气、避免影响就把他们开除了。这就种下了他们对我父亲的怨恨，也是事后引起他们致力陷害我父亲的主要因素。

1947年：国共合作时期，我父亲他在大赉县“党务专员办事处”任宣传科长。大赉县一解放，他就遭人陷害被捕、入狱。被临时关押在看守所里的平房里。到了秋雨绵绵的时节，天渐寒冷。裹着小脚的奶奶，领着我去给父亲送予寒的衣物。看守叫过父亲的名后，父亲从后边挤到门前，说了声“妈”！他从奶奶手里接过衣物。父亲是个坚强不屈的硬汉子，他不管迁到多么艰难和痛苦，他从来都没有流过泪。看守说：“你们走吧！”，奶奶赶紧对我父亲说：“老二，你还有什么事吗？”父亲用他那冰凉的手，抚摸着我的脸，神态平静的说：“没什么事！我没什么事！待他们调查清楚后，我很快就会回家的。”他是那么平

静、那么坦然、又那么自信。遗憾的是，当时我与父亲一句话都没有说。这终生的遗憾一直作为一种深深的内疚留刻在我的脑海里和心坎上。奶奶和我在看守的催促下，匆匆的离开了。没想到；这就成了我最后一次与父亲的见面了。人世沧桑，转瞬间已经五十二年过去了。

1947年春：父亲被捕后，六口之家唯一挣钱养活全家的人离开了我们。困难的生活的重担就落到我母亲的身上。我姥家姓徐，母亲单字名忠。娘家住在大赉县城南近郊的石柞子屯。她6岁时就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幼年是在没有母爱中度过的，十来岁时就担负起外祖父家做饭和针线活的繁重劳动。由老人作主，十六岁就嫁到我们于家。那是1932年春结的婚，33年腊月初五生了我哥梦华；35年十月初三又生了我；39年十一月十一日生大妹妹梦玲；42年正月二十五生了老妹梦芝。那时的母亲，中等身材、纯朴善良，她的心和她的眼睛一样纯净、温顺。在与我父亲共同生活的十四年里，由于父亲脾气不好，生活中不时就充满着闪电雷鸣，使她这个来自乡下，性情温顺、目不识丁，又不善言语的纯朴之人，只能是逆来顺受的在苦闷中抚育着我们。

父亲离开我们时，母亲才二十九岁。从此她独自担负起我们五口之家的生活重担。那时，我们这个孤儿寡母一家，就象失去风帆的船似的，颠簸漂浮在生活的旋涡里。母亲为拉扯我们兄妹四人，贪黑起早做针线活、纺线卖，无论严寒酷暑到聚丰草袋工厂去编织草袋、到城郊苗圃去锄地拔草、到老坎子水产渔场去收拾鱼虾，凡是男人们能干的活，她都撑着干，为养育我们母亲孀居守节已达52年了。这52年，近1.9万个日日夜夜里，她紧咬着牙关、眼含着泪水、心忍着悲痛、肩负着重

担、孤立无援地在苦难中拼命挣扎着，在人生坎坷路上艰难地跋涉着。岁月冷酷无情地把母亲折磨成体瘦如柴、疲惫不堪、愁云满面、目光黯然的老人了。

我还清楚的记得，那是四七年的农历正月十五的晚上，因生活所迫第二天，我就要离家外出领算命瞎子去了。母亲在昏暗的小豆油灯下，用她的旧长衫，一针一线的为我缝制小棉袍时的情景：昏暗的油灯下，母亲红红的眼里，含着没有流出的泪水，乌黑的头发，遮去半屋本来就不很明亮的光线。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手里的针线活。后来，当我学了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诗后，才深深体会到那时母亲飞针走线、含泪无语的心情，那是要把她心中的无限慈爱，和千言万语都缝进那将伴我远行的衣物里去啊！这种母爱的养育之恩，谁言寸草心，怎能报得三春晖呢？母亲在我的心中，永远是一座让我无限崇敬的高大慈爱的丰碑！

我所领的瞎子，家住肇源的农村，姓韩，与我家大费县城格着一条嫩江。我家与他家并不认识，只是同街人给介绍的。他约60多岁，中等个、脸黑黑的，穿着一条黑褐色的棉袍，掖着一个油渍麻花、变成灰色的白帆布的马达子，后口装着一把二胡、和直径一拃的小铜锣，马达子前边兜里装着手巾和两件内衣。当着介绍人任大伯的面讲好，要去的目的地长春北的农安县，然后就往回返，时间约计10多个月，按10个月先交给家款，计40元。每月四元钱，当时只能买四斤麦麸子面的价值，只是能带出一张口，由他供饭，就这样，我就踏上了领瞎子的路。说是由他供饭，他才是一个子都不想花的守财奴呢！每天步行几个村子，进村我就得敲着铜锣叫喊：“算挂了！破关了！算挂了！”的反复叫喊。他则用双手捧着八个眼的小圆葫

芦吹奏。以招引算挂问卜的人。他从不买饭，到吃饭时，他就不收算挂款，要求给顿饭吃，实质就是“讨饭”！在我领他的8个月里，时常也有因算不上挂，而吃不到饭的时候，这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这苦难的遭遇不是太残酷了吗？但我从未哭过，咬紧牙，勒紧肚子也都挺过来了。

半年后路过洪泉时就下午2点多了。从洪泉到下一站杨树林，中间还有五十来里路。本地人说“走不上一半就得黑天，还是住下明天早再走吧！”我说：“先生，半路黑了怎么办？还是住下吧！”韩先生则理直气壮的说：“走！黑天白天都一样。”就这样我们背起早就换下来的棉衣和马达子就走了。大约走了三个多小时，太阳在落下之前照在一片慌芜人烟的破房框上，而在破房框的土墙头上，站着一只狼，它两眼张望着土道上走着的我俩。我马上心就跳得很快，小声的对韩先生说：“路旁有只狗，站在土墙上在看我俩呢！”他问我：“这有人家吗？”我说“没有人家，只是个早就荒废了的土房墙头。”他认识到了危险，马上告诉我“你快拿出铜锣，不停的使劲敲！”他也拿出圆葫芦大声的吹了起来。再一看那狼听到铜锣和笛声跳下墙就跑了！这时，我告诉他：“狗跑了！”他说“跑了也不停还照样打锣！”当我们走进杨树林时，村里人家早就睡了，已经小半夜了。无奈只有在路旁的草垛边猫了半宿。真也奇怪，背着棉衣，又走得那么累，不知怎么走过来的。后来他对我说：“你知道咱们遇到的是什么吗？没人家的地方那有狗呢？那是狼！”这次狼口脱险，是我少年时代最经险的经历了。这次路遇野狼，让他也着实受了警，从此再不走夜路了。

经过哈拉海、柴岗、到了万顺堡。这是个较大的乡，离农安，只剩两站地了。他的算挂营业在这还很兴隆。在这约一个

星期后，住在一家姓李的人家，晚上给这家儿媳妇算挂。她爱人46年被抓去当中央军了，近二年了也没有音信。让先生给算算：人还在不在？有没有吉凶？什么时候能回来？不知怎么地，说他要强奸那女人，把他打得脸都肿了起来。把他又绑了起来，吊在房梁上，把我吓坏了！

第二天那女人的公公问我：“瞎子是你什么人？”我说“什么也不是。我是他雇佣领路的。”“一天给你多少钱？”“一个月才四元钱。”这位老公公气愤的说：“这瞎驴，真白使用人！”老头对我还挺好。告诉我：“这瞎驴干了坏事，不让他走了，今天要送他去官府。”又说：“我们这地方有往白城子和齐齐哈尔跑运输的，我把你托负给他们，你坐他们的运输车回家吧！但是车脚钱让韩瞎驴拿。”我也不知道，朝他要了多少钱？就这样，我乘运输车几天后回到了家。这次从大赉，往南经过八郎站、长山、新庙、木头站、达里巴、扶余、前郭尔罗斯、立新、套呼太、大山、王府、洪泉、杨树林、哈拉海、柴岗到达万顺堡瞎子出事。往返2千余里地。一晃8个多月，音信皆无，妈妈的眼睛都哭坏了！妈妈哭着对我说“我真傻，怎么没想想：让一个不认识的人把孩子带走，就是把你卖了，家里也不知道啊。以后就是给多少钱，这事再也不能干了。”

这年秋，我到大赉耄子班，踩耄子干了一秋。这年冬天到第二年春，给苏家大网当跑水线的，去了兴凯湖打鱼。四个月的冰天雪地的劳动一分钱也没收到。回来时苏家大网说：“联系卖鱼的‘把头’把钱全都骗走了。那里去要钱呢？”那时的弱肉强食、吭蒙拐骗、昌厥得很，那里还有什么公道、合理的德行可言呢！穷人家的孩子，打掉牙、肚里咽，认了吧！好在哥哥这年冬，在大赉县水产公司食堂谋得个小邦工的职业，生活的困

难算还对付过来了。

1948年春：外祖父在城南宋家围子，给我找了个放猪的活干，给7家放猪。我住在一家姓刘的老俩口子家，这家没小孩。吃饭在7家轮流吃，在谁家吃饭，要帮谁家干活。早晨把人家的尿盆倒了，把灶坑的灰扒出倒出去，把饭锅刷了放里水烧上，把饭桌子放好，等后人家吃饭，饭后剩什么我就吃点什么，这一年从四月初到八月末，放了五个月猪，一家一斗粮，计7斗粮。那年头，7斗粮让在家的妈妈和两个妹妹能活半年了。下半年，又给我外祖父家和老丁家、老孙家等放了四个月的马，也是挣的粮食，每家二斗粮，五家又挣了一石粮食，这一年在家里的三口人，还是没饿着。哥哥挣的工钱生活用。

1949年春：外祖父，又在城南70来里路的小五家子和大五家子，给我和哥哥找了个“半拉子”活干。我挣两石粮，哥哥挣四石粮。

我抗活的这家姓孙，村民都因他下巴非常尖长，都叫他孙大下巴。是山东人，当村长，老俩口子，70来岁了，没儿女，要个7岁多点的小哑叭姑娘，不会说话。我正月十五那天晚上到的他家。老太太往炕上放个小长条桌子，拿上来一个大磁花碗，里边装着酸菜炖猪肉，那猪肉很大块、白刷刷的；饭是大苞米碴豆饭。饿了一天了，我一个低着头，狼吞虎咽的吃了不少，老头问我：“你叫什么名子？”我说：“大名叫于梦飞，小名叫连喜，因为我小，在家都叫我小喜。”老太太问我：“今年多大了？”我低着头回答：“虚岁13了！”老太太又说：“我把活说一下：早晨起来倒尿盆、扒灰、温猪食，吃饭前把猪喂了。吃完饭把桌子捡了，把碗刷了。春天，到西大甸子把柴伙烧了。种地后，要去放猪，带‘小丫’。吃完晚饭，把水挑了。”我说“是”。就这样开

始了佣人“小半拉子”的生活。

喂猪、放猪、带孩子，这些活还能应负得过来。就是挑水，确实受不少累。井台在前边，离孙家连进院到屋里有 30 多米远，水桶是木板条做的，上边用一寸铁箍箍着，有三道铁箍，只两只水桶湿的就有 20 多斤，打满水后就有百八十斤，这对一个瘦小干枯的我，真是咬着牙去担这四五挑水。每天挑完水后，就累得气喘嘘嘘了。

春天到了，他们这地方没有柴伙可割，大家都用一张大耙子，耙头下边捞着一个楷秆联子，用肩拉着，耙子挠满了杂草，站下把它抖落在联子上，待联子满了，就抖落在地上，这样一联一联的排例，一车大约拉四十到五十联。这活一干一身汗，人又瘦小，20 多天下来，再也干不动了。这 20 多天，我躺在草甸子上哭了多少次啊！这那里是一个孩子干的活啊！东家求的车，共拉回四车柴草。这个春天，真是个难熬的时日啊！

开始种地了，我就每天放猪上草甸子两次。老太太还让我带着小哑吧，有时还让我背着她。孙家养着两圈猪，一圈是一个公猪和三头老母猪；一圈有两口半大育肥猪，准备到年底杀一口、卖一口，还有 30 来个小猪崽。这年生活还行，虽然一天上下午两次放猪、带孩子、喂猪、担水，夏天又热的汗流夹背，但还应付得了。

时间过的真快，一晃到孙家已经 10 个多月了。非常想哥哥。每天晚上，我都坐在苞米茬子前扒玉米棒，一般到 10 多点多后才可休息。有一天晚上，有圆月，我就向东家请了假，去离这五里路的大五家子，哥哥抗活的李家，看哥哥。

我脚踏着早已枯黄的便路上的小草，迎着胶洁的满月，凉爽的晚风吹在我的脸上，一个人如箭似的快步的走着，约半个

小时就到了。问过李家的住处后，就到了一个门旁有棵大树的独立大院。上屋有灯，但很寂静，我问我哥哥“于梦华是否在这？”门开后，从上层走出一位 50 多岁的胖女人，说“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他弟弟，在小五家子老孙家做工，今天晚上来看我哥哥的。”她告诉我：“你顺街一直往东走，到南北路，道南的场院，他在那打玉米呢！”几分钟我就到了场院。人不多，只有四、五个人，在用连枷打苞米呢。我便问：“于梦华在这吗？”只听到“在这！”我顺从发出声音的方位看去，一个跪在地上打连枷的人，正是我哥哥于梦华。我跑过去说了声“大哥”！就再也说不了什么话了。大约沉默了五六分钟后，哥哥问我说：“你累不累？”我说：“不累，也习惯了！”我问他：“你怎么跪着干活呢？”哥哥没说什么，往后蹭蹭，就指着两条腿说：“因为长疮，夹裤都贴到腿上了！所以，只能这样！”我用手摸一摸，一条腿象人嘴那么大的疮口三四块，都贴在裤子上，我再也说不出话了，我哭了。哥哥劝我说“别哭！你别哭！再熬两个月，就可以回家了！”接着哥哥又说：“天太晚了，快回去吧！”他上衣兜里掏出一个一拃长、酒钟粗的黄铜子弹壳给我，并说：“这是国民党飞机扫射时捡到的。你收起来，留做纪念吧！”我和哥哥分手时，相对无语，只有泪水满面。这情景现在我仍记忆犹新，一想起这些我的心，就如刀绞一般的难受。

又过了一个多月，外祖父和舅舅，还有叫丁大虎的人，赶着三套马的大车，把两家应给的六石粮和哥哥与我拉到了外祖父家。在那个困难时期，六石粮救活了我家和外祖父两家人啊。

当我和哥哥在五家子满工时，新中国宣告诞生了！红太阳的光辉使我结束了寄人篱下、受人剥削的生活。那时是 49 年

的童年。

一九五〇年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八月：

1950年2月：自从由孙大下巴家抗活回家后，已经过去近三个月了。哥哥在大赉县水产公司食堂做工，有了一定的收入；妈妈在大赉县聚丰草袋厂做工，虽然工作贪黑起早，有些辛苦，但收入也有了保证。生活有些好转。

二月初，有一天晚上，妈妈对我们兄妹四个说：现在生活基本有了保证，还是让你们兄妹上学念书吧！哥哥说：我虚岁都16岁了，再上学也大了，我就不念了，继续做工，帮助妈妈维持家庭生活，让弟弟和大妹上学吧。这就样，我和大妹妹就准备上学了。这年我虚岁14岁，怕学校认为年龄大了不收。为了上学，经研究把我的岁数压了两岁，从过去14岁属猪，变为12岁属牛。到大赉县第二完全小学校，插班三年。2月份开学就上学了。

二完小学，在大东门里。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内四栋平房，学生能有1千多人。在我读书时，校长姓马，叫马瑞麟，是伪满白城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已40多岁了。后来，因和许多女学生有两性关系，被撤了职，判了刑。我的第一位班主任叫王坦，女的，也是白城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她教我们的语文课。不到一年就休产假了。在我读到四年时，班主任就换为转业军人胡仁河，他也是教语文的。此人，因与我班一个姓杨的大女生发生关系，小孩，也被抓起来，判了刑。从五年开始，我的班主任就换了两位老师。他也是白城子师范学校毕业的，他是讲数学的。他一直教到我六年毕业。此人，是山东人，大个儿，水蛙脸，跑跑400米、800米是全县运动会的冠军。该老师对

我非常好，在我读书、做人上，为我树立了良好的影响，同班的同学里几个年纪较大的如徐海、张君福、王云珂、崔保安，女同学有韦淑芹、李淑贤、李淑兰、张丽君等与我都是很好的同学。57年8月我回故乡时，还与徐海、张君福三人照了像，照像上还提了《故友重逢》四字。

50年2月到54年8月：这是我少年时代最美好时期。四年结束了小学六年的功课，这说明了一个从小康生活，走上贫困之路，寄人篱下、受人剥削、受尽了饥寒冷眼的孩子，能够上学读书了，是何等的心情？成绩是不白付苦心人的，52年我参加了少先队，先后当上了大队长、五好学生、学习委员。如饥似喝的求智欲、新旧社会经历、更加倍的感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红太阳的温暖，使我愉快的度过了这段美好的学校生活。

52年春：祖父病重时，在大赉城西家里，把当时还住在城里，四街一组的我们兄妹和我母亲找去说：“我对不起你们，老二已经在四八年春就病死了。五年后才告诉你们，因为我在临死前必须把真实情况让你们知道。”他说：“当时，我所以没及时告诉二媳妇，是不愿看到你们这个家散了！”当说到这时，祖父也哭不出声了。这一幕悲惨情景：刹那，几呼空气都凝固了！也正是由于这重重的打击，从此打消了我母亲和我们兄妹，还日夜盼望着有朝一日我父亲他走出囹圄、突然归来的幻梦。是的，父亲！虽然你脱离了那囚禁的活棺材，但你则在那凄凉哀怨的悲愤中，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父亲因开除有作风问题的周徐后，就种下了怨恨。大赉县一解放，他二人又串联几人，告了我父亲。父亲被捕后，被解至当时嫩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判刑四年，应五一年四月出狱。

父亲入狱一年多时间，得肾炎和浮肿病很重，齐齐哈尔监

我通知：“来接病人保外就医。”当时，我祖父得到这通知，因筹措资金，路上又没有交通工具，耽误了一些时间，待祖父到那时，父亲已病逝了。父亲的遗物，祖父在那给烧了。祖父回大费家后，他一直瞒着我母亲和我们兄妹。他怕告诉我母亲，她走道再嫁，我们这个家不就散了吗！

致使我父亲入狱的三条罪状：一是“对孤儿灌输亡国奴思想”。日伪统治时期，全东北都是一个教育政策。这是一个在异族统治下，现实政策的必然产物。如将些罪算在不是制定政策的个人头上，那确是不公正的。二是“造谣诬蔑我军”。我县尚未解放之前，我父亲在“党务专员办事处”担任宣传科长。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政策所需，相互指责，两党相争，难免有相伤之处！凡有历史常识的人，都能理解，翻一下当时的报纸或宣传材料到处可见，这并不司空见怪。从判决材料中所述罪状，并无针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敌对和反革命的具体罪行。三是“贪污公款”。我父亲一向是个奉公守法之人，他是个大道为公、不谋私利之人。而判决材料中，也没能举出一个贪污事例和款项。因此说“莫须有”之罪，是常用的整人手段。如果不是上述三项笼而统之的处罚牌，是不足以使我父亲入狱判刑的。

时代的牺牲人，他的冤魂早已葬埋于建国前，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而葬于地下了。一个人，应该爱憎分明，亲疏有别的。计利当计天下利的人，不管远近都应亲；对人民利益有损害的人，即使是亲也当疏。我父亲他是被时代历史所葬送的牺牲者。莫须有的风波亭的冤魂，不也千百年了吗？我父亲，如若他不是身陷囹圄早逝，我确信：建国后，经过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他这个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会为新中国的